

语言

演变

论

搞
科
学
公
认
的
研
究
，
新
成
果
，
要
想
取
得
社
会
深
二
字
就
下
一
定
功
夫
在

李敬忠 著



广州出版社

语言 演变论

李敬忠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演变论/李敬忠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4. 12

ISBN 7-80592-204-7

I. 语... II. 李... III. 汉语-语言演变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237 号

书 名 语言演变论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责任编辑 李瑞霞 李筱敏

责任校对 雨 农

装帧设计 岑 可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 邮政编码: 511447)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50 千

印 数 1001-4000 册

版 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2-204-7/H·2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是目前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的著作，其中有些文章曾获国内外多项奖励。被评为“国际优秀论文作品”和“中国当代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特等奖和金奖。在理论方面，不仅正确提出语言融合的两种方式 and 途径，而且还突破了斯大林传统的语言融合论。还第一次提出“汉语语族”的新理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在现代汉语、古汉语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将汉语方言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是普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等课程的参考书。

适合各高等院校中文系、语言学系、外语系师生以及语言研究者、语言爱好者使用。



友谊

努力！

努力才能成功。

敬忠同学

李方桂敬赠

李方桂先生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始祖，是世界极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他在40年代移居美国后，继续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汉藏语系语言，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对推动世界语言学，尤其是汉藏语系的研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方桂先生特别对我国的汉语、壮侗、苗瑶等语族许多语言的研究有极深的造诣，著作甚丰，给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及世界语言学宝库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

80年代初，李先生（当时82岁高龄）最后一次带着他的夫人和女儿李林德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回国讲学时，我有幸聆听他的教诲，受益良深。当他得知我正步他的后尘，从事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壮侗、苗瑶）以及汉、粤、闽等语言和方言的研究时，非常兴奋。他说：“汉藏语系是世界语言一个多姿多彩的宝库，但对它的研究，目前还只是一片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将来它的研究成果，定能给世界语言学理论做出很大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很多代人的共同努力。因为一个有上百种语言的语系，要投入很多人力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综合比较研究，包括历史比较研究工作，才能取得成功。所以，你们现在做这个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兴奋之余，他欣然命笔，给我写下了：“努力，努力才能成功！”（题词是1983年9月21日在武汉讲演后的小型座谈会上写的）这几个字对后来人既是鼓励，是教诲，也是重要的启迪。事后，李林德教授说：“据我所知，（我）父亲像这样（即兴）给人题词的还不多。”

由于这份极其珍贵的题词对每个从事汉藏语系研究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劝勉铭言，我不敢私，特献于此。

作者

前 言

十二年前，《语言演变论》在广州出版社朋友们付出了许多辛勤的汗水后，顺利地出版面世了。

由于这本书主要集中论述语言演变的各种成因及各种演变规律；论述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的深层关系；论述“方言”演变为独立语言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可能，且书中所涉及的语言，除汉语（包括古汉语和汉语方言）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也许正因如此，所以，出版面世不到一年，市面已告难求。海内外许多做语言研究和教学的语言专业工作者，正在攻读语言学硕、博士学位的学生，以及对语言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广大语言爱好者，都纷纷来信要求再版重印。

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重印则很简单，由出版社根据需求安排就可以了。问题是有些朋友，尤其是仍在校攻读的朋友，他们在信中十分恳切地希望，最好能对关于语言与方言的相互关系，以及语音演变常见的一些主要规律等问题，从理论上再作进一步的阐述，以便论述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众所周知，语言与方言相互关系问题，是目前语言学领域里一个仍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高难度大问题，特别是要想从理论上将两者的界限彻底阐明，划出“楚河汉界”，虽不能说“根

本不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说：“难度非常之大！”因此，即便是国内外有名的语言学专业杂志，也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专论。

不过，“信任胜千金”。为了不辜负朋友们的信任和厚望，虽然自知能力有限，但是，我还是特意在香港大学给高学位学生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专题讲座，探索性讲述了语言与方言两者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并在课后整理出了《语言和方言关系漫议》一文。同时，更有意参加了两届国际粤语研讨会，分别写了《再谈粤语》和《语音演变常见的几条主要规律》两篇与会文章。

这几篇文章，虽然谈不上能够完全满足青年朋友们提出的要求，但至少可以弥补初版一些重要论述的美中不足。如《语言和方言关系漫议》，就是以较丰富的语言事实进一步深化了《语言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理论；《语音演变常见的几条主要规律》，从普通语音学理论方面，阐明所有语言，其语音演变大体上都离不开这几条最常见的主要演变规律，从而弥补了初版里一些文章因论题所限，谈语音演变不可能全面深谈其演变规律的遗憾。

此外，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广州出版社员工朋友们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自己职责的严格要求，以及对读者对社会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在初版的排印校对过程中，竟然以不足万分之一的错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高质量出版发行，博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次重印，错漏的20多个字将得到彻底改正，让读者们得到更高质量的享受。

作 者

序

马学良

科学研究要立足于创新、开拓，尤其要敢于突破旧框框，建立新的科学论点，这是对科学成果应有的要求。李敬忠的这部文集，就是他近年来科研中有创造性和具有开拓精神的新成果的汇编。

文集中硕果累累，我在病中不能遍览全貌。就以他的引起海内外学者注目的《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一文为例，它突破了汉语方言划分的藩篱，用敬忠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向国内外同行们以论文的形式大胆宣称：粤语不是汉语方言，而是汉语族群中的一种独立语言”。他用大量的历史和语言资料，证明粤语是一种源于古汉语，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百越语发生了大碰撞并相互掺揉，语音、语法、词汇都与现代汉语有着极大差异的独立语言。它跟闽语、吴语、汉语共同组成“汉语语族”，从而填补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汉藏语系里汉语只是孤立的语种没有语族的空白。

的确，在汉藏语系一向的分类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每个语族都包括几个语支，有多种独立语言，有的

语族多达二十几种语言，惟有汉语孤独一支，既非语族，也不是语支，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怀疑了。在汉藏语系中，汉族人口最多，说汉语的人数也最多。一种有十亿人说语言，分布在全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覆盖面积很大。从历史发展看，它与其他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关系。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般规律，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一种语言会演变为数种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就是符合这个规律的。惟有汉语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发展出八大方言而没有一种发展成为独立语言，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李敬忠就是从汉语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提出了汉语某些方言是独立语言的论点。当然，是耶非耶，还要继续探讨，因为任何科学成果都不可能一锤定音，而是不断探索的结果。李敬忠提出这个问题，前提是汉语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尤其应用与之有关的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他的观点是有论据的，不是向壁虚造臆断出来的，因此，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有的认为这是“提出了革命性的研究方向”，也有的认为他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把汉语看作是一个没有语族，只有八大方言的孤立语种的结论作了较大的修正，使汉藏语系里也有个汉语语族，这是汉语研究的一个突破”。

我们知道，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是李方桂先生于1937年最早提出来的。他在英文《中国年鉴》发表《语言和方言》一文提出了中国语言系属分类的意见，认为汉藏语系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1954年，罗常培、傅懋勳先生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先生的分类大致相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大多采用这种分类法。近年来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白保罗在《汉藏语概要》（1972）一书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克

伦语两类；又认为苗瑶语、壮侗语同汉语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其相同或相似处或来自相互借用，或来自类型学上的一致。他还认为苗瑶语和壮侗语在发生学上同印尼语有密切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澳泰语系。近来国外有的语言学家又有汉语属南岛语系之说。

面对中外学者提出的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李敬忠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可以说，李敬忠的语言研究正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在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有深厚的研究，如《论汉藏语系辅音韵尾 - m、- n、- ŋ、- p、- t、- k 演变消失的规律》、《扬雄〈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尔雅〉郭璞注反切考》等论著都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深厚的古汉语基础是不可能进行这些研究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论汉藏语系辅音韵尾演变消失的规律》一文，可以说它是汉藏语系研究史上一个可喜的重要发现。它正确解开了许多人对汉藏语系有这些辅音韵尾语言，其辅音韵尾如何演变消失之谜，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探明了前进的起点。

我认为李敬忠把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40 多年来，我们的语言科学研究有很大进展，尤其一向不为人们一顾的少数民族语言，而今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就以汉藏语系的分类来说，不对同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过去语言的分类，类型学分类法多，发生学方法分类的少，所以根底是不牢靠的。而且研究汉语的往往忽视同系属的民族语言，研究民族语言的往往有的汉语基础又较差，尤其是古汉语的根底浅，因而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不能很好开展。王力先生在他的名著《汉语史稿》中强调：“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

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同样，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更需要对汉语（包括古汉语）有较深的研究才能进行比较，加深对民族语言历史发展的理解。

李敬忠是我的学生，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研习语言学，在语音学和语言科学理论方面，下大工夫，好学深思，是一位优秀的壮族青年学者。其后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在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之后，刻苦钻研，用我国丰富的语言事实，提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两种语言的融合，完全可以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的新观点、新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语言融合观。为了能够更深入地对所研究的壮侗苗瑶等语言进行共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并了解它们跟汉语的关系，他先后钻研了《尔雅》和《方言》，从郭璞注《尔雅》的500多个反切中，理出了《切韵》以前300多年中古汉语的音韵系统。从《方言》中扬雄认为是“楚语”的200条拿来跟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语词逐一对照。结果发现并证实了其中不少是当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经常使用的语词，从而进一步提出，过去收集在《中华大字典》里的五六万个方块字中，有许多已证实是用方块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词。它们仅仅是被当作汉字收集起来，而在各种古籍的篇章中却没有用过。但在民族语言的口语里，它们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所以这样致力于古今汉语的研究，他说，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为了开阔视野，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纵马驰骋，使自己对所研究的问题，看得更深、更远、更准确，因而更有说服力。

李敬忠的治学方法是对头的，他的文章所以有说服力，盖亦在此。

我已年近八旬，喜看少数民族新秀辈出。我虽在病中，捧读鸿篇，有不能已于言者，因记之以为序。

1992 年夏于素园书屋

Preface

William S—Y. Wang

Professor Li Jingzhong has put together 16 of his stimulating papers, and has graciously asked me for a preface. In spite of my initial hesitation, I decided to accept this honor—恭敬不如从命. I would like to do what I can to promote Professor Li's work to a larger number of scholars world—wide. For I think these papers have much to offer to the specialist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s well as to all investigat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Chinese linguistics has a long and worthy indigenous tradition, reaching back over 20 centuries. However,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the study of human language, it began only in the 20s and 30s of this century, with the pioneering works of Zhao Yuanren, Li Fanggui, Bernhard Karlgren, and others. Throughout these several decades, regrettably, the flow between linguis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utside has been an unsteady one. Had this been not the case, I am sure the work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would have won much greater atten-

tion. And conversely, the following pages would have reflected more interaction with studies on similar topics published outside China.

Linguistic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made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s to scholarship at large. However, in my personal perception, there have been two tendencies which limit the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 One is that there is a preponderance of data papers, and a corresponding paucity of attention paid to what these data mean in terms of larger questions of typology, universals, and relationships. In my addres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¹, I have described this situation as “data—rich and theory—poor.”

As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of this imbalance, the data collected without a larger goal in mind are often of rather uneven quality, and much of them lay inert on library shelves. Occasionally, these data are exploited, and sometimes distorted, by others to support various fashionable theories with little regard for the scholars who gathered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The best way out of this dilemma is to constantly be aware of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ata one is collecting and handling. Such attention is certainly shown in Professor Lijingzhong's papers collected in this volume.

The other tendency is the virtual separation of the study of Hanyu and the study of the other languages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two areas is sponsor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reported in different journals. A regrettable result of this artificial separation is that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the several millennia of extensive mutual influence are almost totally neglected.

In that same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 advocated "research on many non—Sinitic languages, such as Altaic, Austric, Tibeto—Burman, etc., especially o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Han dialects." "Afrer all", I reasoned, "China is a Sprachbund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Her linguistic fabric has been woven together over the millennia from many intertwining and inseparable strands."

Paradoxically, topics for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such as substratum, creolization, multilingualism, etc., have never received their due of scholarly atten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context, with its extraordinary time depth of texts and great diversity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is an especially fertile arena for investigating these topics.

It is here, in particular, that Professor Li Jingzhong's efforts are to be lauded. For his is one of very few voices to remind us of the extremely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of the languages of China, from the ancient days of Erya and Fangyan, to the modern Zhuang, Dong, Miao, Mo, as well as the Cantonese spoken in South China today. He is a native speaker of some of these languages, and has first—hand experience in all of them. And he studies the modern languages with larger questions of genetic relations clearly in focus, simultaneously making special use of the priceless information preserved in the ancient texts.

In short, then, in addition to the detailed contributions made in the following pagees, Professor Li has clearly risen above the two tendencies diseussed above. My enthusiasm is based on the broad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his work exhibits, as much as on the many

specific results reported in it.

This is not to say, of course, that every problem discussed in these papers has been conclusively solved. For instance, papers #2 and #3 treat the loss of syllable endings in Sino—Tibetan, using an approach similar to that Matthew Chen (陈渊泉) and I adopted in 1975 in our analysis of Chinese dialects.^② We noted then that the loss of endings proceeds along several routes. It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why it is that certain systems develop along one route while other systems along other routes.

In paper #4, Professor Li argues that Yue is an independent language within the Sinitic family. Similar arguments can be made, of course, for each of the major groups, e. g., Min, Wu, Ke jia, etc. This is also a question which has long intrigued me^③. In biology, when organisms can not breed successfully, we separate them into different species. In linguistics, the problem is not nearly so clear—cut. Not only do we lack such criteria as interfertility, there are many other complicating issues such as social grouping, individual variation, gradient intelligibility, etc. Here again, much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such as the grouping experiments pioneered by C. C. Cheng (郑锦全), based on structural similarity and mutual intelligibility.

As a last example, I may mention the exciting resemblances which Professor Li has found between the forms in Fangyan and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 in various minority languages, as discussed in paper #14. Such research continues in the line of work by Norman and Mei, who reported early lexical borrowings from the Austroasiatics^④. The uncertainty with Professor Li's results has to do